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回 顾

[美] 爱德华·贝拉米 著





2 023 0939 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回 顾

——公元2000—1887年

[美] 爱德华·贝拉米 著

林天斗 张自谋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回 顾

——公元 2000—1887 年

[美] 爱德华·贝拉米 著

林天斗 张自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82

196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字数 168 千

印数 3,700 册

印张 8 插页 4

定价: 1.2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序 言

1888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社会空想改良主义长篇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这本书出版后曾经风行一时，在美、英各地销售一百万册以上，并被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等国文字。

《回顾》一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从幻想的波士顿城一百年的“惊人变化”，叙述想像中二十世纪的美国新的社会、生产制度。贝拉米在这部作品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矛盾和弊病，提出了空想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

爱德华·贝拉米写作《回顾》一书，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过渡。到了八、九十年代，各种垄断组织遍及所有工业企业部门，成为垄断资本高度发展的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起来。1873年和1883年，美国发生两次经济危机，造成生产缩减和萧条，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在垄断资本的排挤、打击下纷纷破产，失业工人迅速扩大到数百万之多。八十年代，美国已成为贫富两端极为悬殊的国家。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富豪掌握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社会财富。垄断资本向

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进行空前的压榨。这时，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劳动血汗制度，绝大多数工人每日劳动时间在十小时以上，有的竟高达十五小时。资产阶级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数次降低在业工人工资，并且操纵市场，不断提高工业消费品出售价格，使广大工人、农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生活日益贫困。

《回顾》一开始就向读者揭露这座富人的天堂和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作者把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形象地比做一辆巨大的车子，广大劳动群众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艰苦地拉着逍遥自在的乘客。拉车人在无情的饥饿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景象凄惨，而富有阶级却自命高人一等，理应在乘车人之列。贝拉米抨击资产阶级依靠资本投资剥削工人，作为“永续的赋税”，利用失业者的穷困和“不得已”，迫使别人为自己服务。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劳动者担负全部沉重的担子，忍饥挨饿；富有的阶级游手好闲，却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一个个肠肥脑满、珠光宝气。贝拉米指出，垄断资本产生以后，“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悬殊”，他说，资本集中比“任何暴政更为可怕”，大公司为人们“准备了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下贱的奴役的枷锁”，使人类遭遇到了“更为卑贱、更为可怕的命运”。作者在小说结束之前真实地报道了城市贫民窟的“地狱”生活。他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极不公平、极不人道的。

贝拉米说，私人资本占有制度在经济上也是“荒唐”的，这种制度由于私人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失当，由于相互间的竞争，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商业危机，以及资金、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浪费，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说，整个资本主义生

产领域是一个“辽阔的战场”，那里进行着“真正的战争”，作坊和车间是“无数个堡垒”，作业主都把同行看作应该打倒、扼杀的敌人。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人人背后有一个“人世无常”的幽灵，大公司并吞小公司之后，垄断组织之间还要进行规模更大的火并，直到最大的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再转向垄断市场，任意抬高价格，向社会大众战斗，使人民“处于饥饿的边缘”。贝拉米目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停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后果，他断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危机像“旱灾和飓风那样，是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或控制的”。

贝拉米意识到私人资本占有制度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他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要求改变这个“野蛮的”、“不道德的”生产制度，实现合乎人类“理性”的、“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但是，贝拉米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早已在人们心目中破产了的、启蒙学者“理性王国”的诺言。在他写作本书的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和著作正在欧、美两洲广泛传播，贝拉米显然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启发，他通过小说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长眠一百多年后的传奇式游历，描绘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社会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以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为蓝本的。

贝拉米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实现工商业国有化，由国家接替一切私人企业，成为唯一的资本所有者。在贝拉米的理想社会方案中，整个国民经济分归十大生产部门，由国家统一领导管理，按照人民的消费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贝拉米设想，由于生产不再归私人经营，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取消商店、银行、货币，由国家货栈

直接分配产品代替商品交易,居民可以通过城乡方便的分配网,领取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他写道,产品应由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所以新的分配制度不计劳动贡献多少,完全按照平均主义原则,使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得到相等的分配数额。新社会还为居民建立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店,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与男人一同参加生产大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贝拉米说,体力劳动应该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义务,但是他认为体力劳动“并不是最重要、最有趣或最高贵的”,他说只有脑力劳动“才是人生的真正涵义”,这一点反映了作者固有的思想偏见。

贝拉米还描写了幻想世界中的政治制度。他设想未来的国家行政机构与生产管理系统是统一的,十大生产部门以及各部门所属行业负责人,也都是代表国家的官吏。他说,未来政府和官吏的主要职能是指挥生产大军,监督生产。公务人员都是廉洁奉公的“人民的总管和仆人”。一切军队和监狱将被取消,只保留为数极少的警察和法官。贝拉米主张在各大洲实现上述经济、政治改革后,建立全球性的自由联邦同盟,最后逐步过渡为一个全世界单一的国家。那时,全人类将不再有贫富的差别,也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共同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尽管贝拉米振振有词地宣布,旧社会正在预示着本身的灭亡,新世纪的曙光已在眼前,但是人们不难断定,这个玄想的方案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乌托邦。贝拉米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因此,他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也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展望通向未来的道路。

贝拉米以超阶级的人性论作为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

点。他在本书中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论证所谓人的本性是善的，他说，人生来都是“慷慨的”而不是“自私的”，是“慈悲的”而不是“残忍的”。只是由于旧社会生活条件的长期压力，才使人性堕落的倾向掩盖了人性优良的倾向。贝拉米对阶级社会中经济、政治地位根本不同的各个阶级的本性和行为不加区别和分析，他把资产阶级的剥削、投机、舞弊行为和劳动人民在饥饿、死亡战线上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肮脏的战斗”和“人性的堕落”，同时又直接为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辩解。他说，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为了生存，为了养育子女，只能被迫进行欺骗、榨取、排挤、虐待工人、剥削债务人，从软弱的竞争者嘴里夺取食物等等，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余地”。根据这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推论，贝拉米进一步把阶级社会的种种罪恶与剥削统治阶级分割开来，他写道：“人类的遭遇之所以如此不幸，不能归罪于个人，也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阶级，而是由于一种令人痛心的错误……是人类的一种严重过失。”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在极力模糊阶级界线，为资产阶级开脱罪责。

在贝拉米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所谓“人类健全理智获得胜利”。他说，这一伟大变革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不需要革命和任何暴力行动，不需要牺牲一个人，只要等到社会公众舆论成熟，就可以由国家接收私人垄断公司的财产，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贝拉米说，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为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富有的、贫穷的、所有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只有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政党才能担负建立新社会的任务。贝拉米在本书

中攻击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太狭窄”，不能实现所谓“全国性”的目标，他甚至恶毒地攻击工人阶级政党存在一天，就只能对社会改革起“阻碍作用”。

《回顾》一书出版后，曾经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他们在美国许多城市中成立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从城市中产阶级中征集会员，要求通过“有理性的和平手段”，实现生产和分配国有化，这些活动与美国工人运动没有联系，只不过是一群资产阶级文人的改良主义思潮。

贝拉米所写《回顾》一书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有不少类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那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还未作为独立的、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走上政治斗争舞台。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许多方面还是革命的。他们抨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宝贵材料。他们对未来社会所作的种种积极结论，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玄想的未来社会的方案和离开阶级斗争的种种错误，是与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秘密，而且总结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

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根本道路。四十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国际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到了七、八十年代，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法、意、英和西欧一些小国，先后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工人政治团体，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在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战斗。

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也有蓬勃的发展。七十年代，美国的煤矿、纺织、铁路工人曾经举行多次罢工。1877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工党。八十年代，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并在1886年5月1日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美国工人运动“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克服的力量开展起来，以野火燎原的速度蔓延开来，并从根动摇着美国社会”，不仅使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惊恐”和使他们“陷入了张皇失措的绝境”^①，而且简直把欧洲的统治者也“吓呆了”^②。

贝拉米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强有力的斗争形势面前，已经预感到一次震撼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他写道：“我们感到整个社会正在失去重心，有随波逐流的危险，谁也不知道它要漂到那儿去，不过大家都怕它触礁。”这一段话，恰好反映了当时美国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恐惧。贝拉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黑暗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害怕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级的阶级斗争,于是他模仿、塑造了这样一个玄想的空中楼阁,极力宣扬全人类的和平进化,企图以此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风暴,取消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①《回顾》一书戳穿了资产阶级吹嘘的所谓美国没有贫穷,没有阶级对立,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例外的“乐园”等等神话,这是积极的、可贵的。但是,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相背离,而且在实践上完全无视美国工人在1886年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伟大政治意义,对于当时美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遵照《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基本原则,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郭用宪

1963年6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页。

目 录

《回顾》作者的生平	1
作者前言	11
第一章至第二十八章	13
后记	239

《回顾》作者的生平

“我们要求
发挥出我们全部的力量，我们人类的力量，
从同一起点出发，大家具备同样的行装。”

“但是一旦完全觉醒，每一只巨臂挥舞，
每一根筋肉绷紧，伟大的心脏急剧跳动，
他必然会猛然跃起，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的漫长胜利的征途这才开始，
这才是他的诞生的时刻。”

—布朗宁—

这个伟大诗人的诗句表达了爱德华·贝拉米创作他的名著时所抱的目的。这个目的将促使那个赋予我们国家以生命的伟大宣言^①在我们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并将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给予每人以立足之地，从而使他获得空前未有的惊人进步——这将是人类第一次能毫无阻碍地利用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可能性。

自从美国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富有才华的作家通过写作《回顾》一书成为一个热情奔放的社会改革家以来，迄今已十二年了。他的作品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运动注定要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的特长以前在《海顿霍夫医生的治疗法》（“Doctor Heidenhof's Pro-

^① 指 1774 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宣言》。——译者

cess”)、《拉丁顿小姐的妹妹》(“Miss Ludington’s Sister”)这类传奇和许多短篇小说中已经露出锋芒，这些短篇小说具有优美丰富的想像力，主要的特色是对精神方面的题材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发展。《盲人世界》(“The Blindman’s World”)和《这可能落到谁的头上》(“To Whom This May Come”)这类故事，使过去二十年的杂志读者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海顿霍夫医生》发表后立即被认为是一篇显示非凡才能的心理研究作品。英国一个刊物指出：“其作者在智力方面是霍桑的直接继承人。”欣赏爱德华·贝拉米早期作品特有的那种独创性和不同凡响的风格的，在美国也不乏其人。在所有这些创作中，都有一种预示作者未来活动的强烈而突出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对于人性内在的善良具有坚定的信念，对于真正的和广义的爱的涵义有所领悟。《回顾》一书虽然表面上是一部传奇小说，然而却普遍被认为是采用小说体裁的一部伟大的经济论著。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本书不能得到像它业已获得的那种地位；这位才能卓越的小说家在创作中运用了充分的技巧，使本书娓娓动听，并对广大读者的想像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物移到二十世纪末的那种匠心独具的手法，本书结尾描绘的梦境所具有的那种生动而富于戏剧性的特点，都足以证明这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的艺术手腕使本书在传奇小说中独创一格。倘若当时社会接受本书的条件尚未成熟，则它也不会获得成功。材料原已具备；它们中间的星星之火便可燎原。本书出版不过十余年，而它帮助煽起的骚动却遍及全世界。它指导了经济思想的方向，确定了政治行动的方法。

爱德华·贝拉米诞生于 1850 年——几乎恰恰正当十九世纪

的中叶，对于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他注定要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他的家一直在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契柯皮瀑布村庄（现已划入契柯皮城），而契柯皮城是以斯普临菲耳德为中心的市镇之一。他住在教会街的那幢房屋，长期以来是他父亲——当地一位受人爱戴的浸礼教会牧师——的住宅。他的先辈是牧师，这也许对他基本上的宗教本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外祖父本杰明·普特南牧师(Rev. Benjamin Putnam)是斯普临菲耳德早期牧师之一；而在他父祖辈中，则有康内提克特州伯利恒地方的约瑟夫·贝拉米博士。约瑟夫·贝拉米博士是革命时期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①的朋友和阿隆·伯尔(Aaron Burr)^②的教师。然而他在成年以后，却摆脱了一切教派的束缚，但这种祖传的特点，却使他的社会观带有强烈反唯物论的唯心特色；一种伦理的目标主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单纯的物质繁荣不值得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去奋斗。但他却认为物质福利的平等，是实现人类真正精神上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年轻的贝拉米进了斯克内克塔迪地方的协和学院(Union College)，但未毕业。留德一年后，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但从未执业。文学事业对他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而新闻事业似乎是从事文学工作更方便的门径。他最初从事新闻工作是在《纽约晚报》(“Evening Post”)担任编辑，后又转到斯普临菲耳德的《协和报》(“Union”)。除了漫游欧洲外，曾取道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

①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著名神学家和心理学家，对美国的基督教思想曾有重大影响。——译者

② 阿隆·伯尔(1756—1836)，美国政治领袖，曾任美国第三届副总统(1801—1805)。——译者

旅行,归途横过大陆,使他在地理方面对世界的阅历扩大了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在当地中学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专门发表社会改革的见解的,这预示着他后来的工作。当《回顾》一书问世后,当年轰动一时,有家报纸便指责贝拉米先生“沽名钓誉”。对于了解作者那种稳重克己、几乎是羞怯的性格的人们来说,再没有比这种指责更为荒谬的了。对于利用惊人的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巨大号召力去发财致富的一切机会,他都不屑一顾。曾经有人邀请他作公开演讲,可以使他顿时发财;曾经有杂志编辑请他撰写文章或小说,表示对他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曾经有出版家劝诱他再写一本新著或乘此机会将他的短篇小说编辑出版,保证能够畅销——对所有这些,他都极其冷淡。在他准备就绪、着手第二部著作以前的一切公共活动,仅限于作两三次公开演讲,在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有一个时期编辑他在波士顿创办的《新民族》(The New Nation)周刊。对于一切世俗的动机,他都无动于衷,好像他就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他那个新社会制度下的人民一样。通过他的作品,他结识了许多私人朋友,他们都认为他有可爱的性格;事实上,与他相识就会对他产生喜爱。他具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的谈吐敏捷风趣,能对别人的暗示应答如流,并且因为亲切幽默,有时还很俏皮,显得生气勃勃。他厌恶辩论,认为无益的讨论浪费精力,曾经戏谑地说,倘若有改革家住在他附近,他一定迁居。

《回顾》一书的主要特点,使它与一般《乌托邦》著作有所不同。这些特点表现在:它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产业组织的具体计划,主张所有的人对于劳动产品或公共收入都分配到相等的份额,理由

就在于所有的人对大自然的财富如空气和饮水都是平等享受的；因为在个人对劳动生产所贡献的力量和他在劳动产品方面应享受的份额之间，根本无法根据不同的等级作出任何公平的比例。但本书只不过勾划出这种制度的轮廓，后来，经过一个继续研究思考的时期，许多论点需要进一步阐发。贝拉米先生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和最成熟的思想，用来阐述这种新秩序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依据，他认为社会演变的自然进程将会产生这种新的秩序。

他最后的著作题名为《平等》（“Equality”）。这是一本比《回顾》更为精湛的著作，事实上是阐述书名平等问题的的一部渊博的经济论著。这是著名的《回顾》一书的续集。它的主题思想在于认为美国独立宣言（具有美国真正宪法的特点）的不朽绪论，在逻辑上包含着普遍经济平等的完整声明，这种平等是集体的国家对其个别成员所保证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是经济平等，难道这不是对于三种权利——生活、自由、幸福——所提出的明显的、必需的和惟一可靠的保证吗？没有物质基础的生活还成什么生活？除了对于生活的物质基础享有平等的权利以外，还有什么生活的平等权利？什么是自由？如果人们必须向他们的同胞要求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必须从别人手里去找面包，他们怎么能够自由？任何一个政府，除了使人们在独立的地位上取得劳动和生活的条件外，还能用什么其他办法来保证他们的自由？除非政府掌握就业和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制度，还有什么办法实现这点？最后，一切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的含义是什么？既然幸福完全依靠物质条件，什么样的幸福是和经济条件没有关系的？除保证经济平等外，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一切人享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呢？

本书具有很多见解,充满发人深思的部分,并富于值得引证的章节,因而被提倡新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当作援引论点的宝库。正如阅读《回顾》一书那样,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和深思远虑的读者在放下《平等》一书而环顾周围世界时所产生的感情,同一个住在贫民区公寓的人在“乡间度过一周”以后,回到熟悉的环境,又闻到令人作呕的臭气,又听见喧闹杂乱的声音和永不休止的争吵时的感情相似。

但是写作《平等》一书,对于作者的体力和精力来说,是过分艰巨的任务。由于身体素不壮健,他终于病势沉重。巨大的精神力量顽强地支持了衰弱的体力,使本书得以写成,这是极其勇敢的事情。肺病,新英格兰传统的普遍疾病,突然发作起来了。1897年9月,贝拉米先生和他的家属前往丹佛,竭力想找到治疗的方法,虽然他并不抱有希望。

他的作品在西部曾产生普遍而又深远的影响,他在西部所受到的欢迎是使他最后一次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信件来自矿区、农场和乡村,人们都渴望替他服务,以表示对他的热爱。

上面已经提到贝拉米先生特有的那种罕见的谦虚,同时,他根本不愿接受任何私人 and 公众对他的赏识,也许由于这两种情况,他不知道自己已享有国际声誉。他的作品十年间在英美销售约一百万册,并曾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文字和方言。这样一位作者,尽管离家两千英里,也不会感到自己没有朋友。

当他在科罗拉多州受到了欢迎,他十分感动并且表示深切的谢意。他感到自己不久将要去世,因此在1898年4月离开了

当地。

他曾经热望重新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回去住了一个月以后，于5月22日星期日早晨逝世，遗下妻子和两个小孩。

在当地举行简单葬仪时，他的亲属以及终生相交的朋友围绕着他的遗体，朗诵了从《回顾》和《平等》两书中摘出的下列几段话，以他自己的语言恰当地说明他崇高的一生的真诚愿望：希望人类进入更完美、更崇高的境界。

“在旧约里，蛇不是说过‘如果你吃下智慧树的果实，你一定会像神一样’吗？这种诺言在口头上是真实的，但显然这棵树有些毛病。也许这是一棵含有自私智慧的树，不然，就是果实还未成熟。这个故事是隐晦费解的。耶稣后来讲了同样的故事，告诉人说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孙。但他对于他所指点给他们的树，一点也没有弄错，而且果实也是成熟的。这是爱的果实，因为博爱是最崇高、最完整的智慧的种子和果实，又是因和果。通过无限的爱，人变成了神，因为这样，他感到自己和上帝结成一体，一切事物都在他脚下。‘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他的爱在我们心中完成。’‘凡是爱他同胞的人，心中就有光明。’‘如果有人说我爱上帝，却仇视他的同胞，那么他就是一个骗子。’‘凡是不爱他同胞的人，永沦死亡。’‘上帝就是爱，人们心中有爱，也就有了上帝。’‘凡是有爱人之心的人，会理解上帝。’‘凡是无爱人之心的人，不理解上帝。’

“耶稣关于开始过神的的生活的条件的教义，精华就在这里。我们从这里面可以找到充分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当一种非人道的社会制度在人类与上帝之间筑了一堵墙的时候，在很久以前就被耶

稣、后来又被其他圣徒所找到的启示，不能被一般人找到，并且为什么一旦这堵墙被推倒以后，启示便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

“‘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试看这些话是怎样通过人类最后找到上帝的途径而实现的！记住，这种途径不是直接地、有目的地或自觉地去追求上帝。人类在推翻旧社会而建立友爱的新社会时所表现的巨大热诚，基本上或思想上不是由于对上帝的热诚。这主要是一种人道主义运动。这是人们热情的相互融合与交流；是一种忏悔心情的突发；是相互热爱并对共同福利自我献身的热情冲动。但是，‘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所以，人们便找到了这条途径。在人类历史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时刻，一个最神圣的时刻，这时新发现的相互拥抱着的世界中的友爱热情和对上帝降福的那种难以描述的激动交织在一起，好像上帝的手紧握着人们互相握着的手一样。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并将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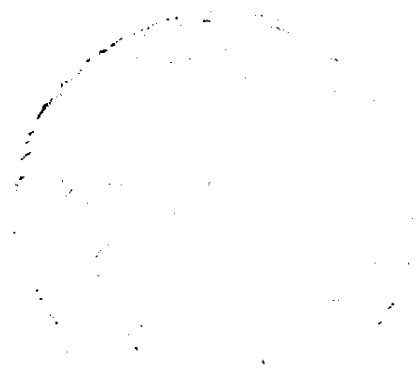
“你们的预言家和诗人在感情激动的时刻，已经看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个阶段，但对于你们大多数人，这种说法难以接受。今天，当生命将告结束，不再被哀伤的阴影所笼罩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迫切等待的心情。倘若年轻人不了解，在不久的将来死亡的大门也会对他们敞开的，这种迫切等待的心情将使他们对老年人产生嫉忌。在你们的时代，人生的低调似乎是一种无法言传的哀伤，正如住在海滨的人们听见海水呜咽那样，这种低调每当猥琐的俗事的喧闹嘈杂的声音暂时停息，便清晰可闻。现在这种低调变得非常欢腾，我们也还可以听见。

“你们问道，既然人类不免一代又一代地死亡，我们还期望些

什么呢？我回答：广阔的前途展开在我们面前，但由于前途光明灿烂，我们却看不到最终的目标了。人类要回到作为‘我们的归宿’的上帝那儿去，有两条道路：个人通过死亡的道路回去，人类通过完成进化的道路回去。到那个时候，目前还未显示出来的上帝的秘密也将完全被揭露。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遮住眼帘，向前猛进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脱颖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有人竭力反对爱德华·贝拉米的理想，理由是这些理想的基础只不过是单纯的物质福利。面对以上引证的话，他们还能坚持那种态度吗？

西尔威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



作者前言

波士顿,肖穆特学院历史学系,

公元 2000 年 12 月 26 日。

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享受到如此简单而又合理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幸福,这种制度似乎只是人类健全的理智获得胜利的结果。当然,要使那些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能够理解不到百年就臻于完善的现有社会组织,那确是很困难的。但是,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比这更确凿的了,即直到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人们还一般相信,旧的生产制度尽管具有一切令人痛心的社会后果,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零星点滴的改良,却注定会永世继续下去。自从那时以来,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竟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啊!人们以不以为奇的欣然同意的态度适应了他们环境的纵然提前实现却似乎已属十全十美的变革,而这种态度又是多么难以比拟!改革家们怀着满腔热忱从事工作,只期望后世以深切的感激来答谢他们,而他们的这满腔热忱又有什么考虑能够使它冷淡下来!

有些人虽然希望能就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社会对比获得更具体的概念,但对有关这个专题的一些历史著作中的正式论述却又望而生畏,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这些人有所帮助。作者根

据教师所谈的经验,知道一般人都把学习当作一件苦事,因而试图以传奇小说的体裁来撰写本书,以减少说教的性质。作者极盼这本作品的本身或不至于完全索然无味。

就读者来说,对现代社会制度及其基本原则业已司空见惯,有时可能会对利特医生在这方面所作的解释,感到平淡无奇——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在利特医生的客人看来,却不是司空见惯的。而撰写本书的目的,显然也在于期望读者暂且不要把这些事实看作平淡无奇。让我再说一句。赞美这个黄金时代的那些作家和演说家所采用的几乎千篇一律的主题都不是论述过去,而是论述未来;不是论述已获得的成就,而是论述将要取得的进步,即不断向上向前的进步,直到人类得以掌握目前尚难预测的命运。这种写法固然极好,但在我看来,要使人们敢于展望人类未来一千年的发展,除了“回顾”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以外,别无其他更可靠的根据了。

作者盼望本书能侥幸在题材方面引起读者发生兴趣,从而宽容其创作方面的缺陷。作者本人抱着这种愿望站到一边,且让朱利安·韦斯特先生来现身说法吧。

第一章

我在1857年诞生于波士顿城。“什么！”你说，“一千八百五十七？这是个奇怪的差错。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一千九百五十七。”对不起，我并没有说错。我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857年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顿的东风的吹拂。我向读者保证，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东风^①，跟现时公元2000年的东风是同样凛冽刺骨的。

这些话乍听似乎荒唐，等我再补充一句，说我的外表象个三十左右的青年，那就格外不合情理，因此，如果读者认为下面仅是些欺人之谈，不愿再看，那也未可厚非。不过，我诚恳地向读者保证，决不是故弄玄虚，只要读者再多看几页，我包管你们会完全相信。那么，如果我可以暂时假定，对自己的出生年月要比读者知道得更清楚，并保证我的假定有所根据，我愿意把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文化，或任何类似的文化，不过发展这种文化的各种因素却已经在逐渐形成中。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划分为穷人、富人、受教育的人和无知识的人四个阶级，或更确切地说，被划分为四个民族（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别远比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要大），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纠正。我本人既富有而又受过教育，所

^① 波士顿的东风寒冷刺骨，相当于中国的北风。——译者

以享受到当时最幸运的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幸福。我养尊处优，只顾追求人生的乐趣和考究的享受，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却从未作出任何贡献作为报答。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就是这样，倘若我有后代的话，我希望他们也能享受这种舒适的生活。

但是，既然我没有为社会工作，又怎样能生活呢？你会这样问我。为什么社会要养活一个能够工作却游手好闲、一事不作的人呢？答复是，我的曾祖父攒了一笔钱，从此他的子孙就一直靠它过日子。你自然会推测，这准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因为经过三代游手好闲的子孙的挥霍，它还没用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笔款子原来并不大，不过既然子孙三代依靠它来享受优闲的生活，它比当初就要大得多了。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奥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不过是极其巧妙地运用了那种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压在别人肩上的手段。这种手段现在幸已失传，可是当年你们祖先却把它发展到完美的境界。它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据说谁掌握了它，谁就可以说是依靠投资的收入来生活。在这里，如果要说明古代的生产方法如何使得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将会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这里我只能说，投资的利息就是拥有财富或继承财富的人对那些从事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所征收的一种永续的赋税。千万不要认为，按照现代观念看来如此不近人情、如此荒谬的办法，从未受到你们祖先的指摘。从远古起，一些立法家和先知先觉一直都为取消利息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作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古代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描写的十九世纪末叶这一时期，各国政府一般都根本不再想在这方面加以限制。

为了让读者对当时人们共同生活的方式、特别是贫富之间的关系有个大致印象，我想最好把当时社会比作一辆巨大的车子。广大群众被驾驭着，在一条坎坷不平、布满砂砾的道路上艰苦地拉着车子前进。尽管他们必然走得很慢，但在饥饿的驱策下，也不得拖延。沿着崎岖的道路拉车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车上却满载乘客，甚至当车子到了最峻峭的地方，他们也从不下车。车上座位非常舒适，他们迎着和风坐在那里，脚不沾尘，可以逍遥自在地观赏风景，否则便对那些筋疲力竭的拉车者评头品足。当然，人人都想占据这样的座位，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每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想替自己在车上占到一个座位，死后传给子孙。按照乘车的规则，每人可以把座位让给自己指定的人，但另一方面，也会发生许多意外事件，使他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座位。尽管这些座位那么舒适，它们却并不牢靠，只要车子突然颠簸一下，有一批人便会从车上摔到地上。他们刚才高高兴兴地坐在车上，这时却不得不立刻拿起绳子一同拉车。毫无疑问，一个人认为失去自己的座位是很不幸的，因此乘车者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担忧，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他们只顾着自己吗？你又会这样问了。当他们把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他们兄弟姊妹们的牛马生活相比，而且明了自己的重量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难道不感到自己的奢侈生活难以容忍吗？难道他们对于那些仅仅由于命运的播弄而与他们处境不同的人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哦，是的，有过这种同情；乘车者也时常向那些无可奈何的拉车者表示体恤，往往当车子经过难走的道路或到达特别峻峭的山坡时，尤其如此。每当这个时候，拉车人拚命挣

扎着，在无情的饥饿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许多人拉着车子昏倒过去，陷在泥里受人踩踏。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片非常凄惨的景象，往往引起乘车者表现一种极可钦佩的同情。这时，这些乘客会吆喝着鼓励那些紧拉绳子的苦力，劝他们要忍耐，告诉他们虽然命苦，但可以希望从来世得到好报，有的人还出钱替那些伤残者买些药膏之类的东西。大家一致抱怨这辆车子这么难拉，当这段特别难走的道路过去以后，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们松了一口气并不是完全为了拉车者，因为在这些行车不便的地方常有翻车的危险，说不定大家都会失去座位。

事实上，也得承认，拉车的苦力所呈现的悲惨景象主要会使那些乘客更觉得车上座位的宝贵，更要拼命地占住不放了。如果乘客们一旦能够担保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决不会跌下车去，那末除了出钱买些药膏纱布之外，对于拉车者的一切，大概也就极少放在心上了。

我很清楚，在二十世纪的人们看来，这种现象是极不人道的，但有两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多少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大家确实相信，除了多数人拉车、少数人坐车的办法以外，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不论是挽具、车子、道路或劳役的分配，都不可能加以彻底改革。过去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这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无可奈何。既然没有补救办法，按理也就不必枉费心机了。

另一个事实更加稀奇，原来车上乘客都有一种奇妙的错觉，认为他们和拉车的兄弟姐妹们不尽相同，有着更优秀的血统，高人一等，理应在乘车之列。这话听来似乎费解，不过我既然曾经坐在这

辆车上,而且也有过这种错觉,我的话就不能不信。这种错觉有个最古怪的特点:不论是谁,哪怕从地面爬上车子,还没等到手上车绳留下的伤疤消失,便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祖祖辈辈一向很幸运,能在车上占有座位,于是便断然相信,他们一辈人同普通人本质上有所不同。有了这样一种谬见,显然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疾苦所抱的同情就会削弱,从而变成冷淡而空洞的怜悯了。在本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里,我自己对于兄弟们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谬见是唯一能够解释我的冷淡态度的借口。

1887年,我年满三十岁,虽然还没有结婚,但已经同伊蒂丝·巴特勒特订了婚。她和我一样,也是个乘车者。那就是说,她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我希望这种说法已经能使读者对我们当时的生活有了一些概念,大可不必再详细叙述了。在那个时代,只要有钱就能使人获得生活中一切舒适和考究的享受。如果一个女人有钱,她就会有許多求婚者;何况伊蒂丝·巴特勒特除了有钱以外,还是一个美丽而风姿绰约的姑娘哩。

我知道,我的女读者们对这番话会提出抗议。“她可能是漂亮的,”我听见她们在说,“至于风姿绰约,那就绝对谈不上了,因为她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服装,头上带着令人发晕的一英尺来高的头饰,身后拖着长得奇异的裙子,那种矫揉造作的式样,较之以前裁缝设计的任何式样都更会破坏人体线条的优美。你想,谁要是这样打扮,还会显得风姿绰约,那才怪哩!”这话说得有理,我只能回答说,二十世纪的女人由于穿着剪裁合式并能充分表现女性美的服装,显得可爱,但是我还记得她们曾祖母的形象,所以敢于断言,不论

是什么奇装异服，也不能完全掩盖她们曾祖母的风姿。

我们只等新居落成就举行婚礼；我盖的那所房子座落在城内最理想的一个地区，即主要是富翁聚居区。大家要知道，当时评定波士顿各住宅区的优劣，不在于自然环境，而在于邻居的情况。每个阶级或每个民族都各有定所。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我们开始兴建房子时原本希望能在 1886 年冬季落成。但是到次年春天它还未竣工，我们的婚期也只好推迟了。这种拖延使我这样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感到特别恼火，而其原因则是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也就是说，所有的砖匠、泥水匠、木匠、漆匠、铅管匠以及其他同营造业有关行业的工人们都联合起来拒绝工作。我记不得究竟是什么特殊原因引起了罢工。那个时期人们对罢工已经司空见惯，也就不再去寻根究底了。自从 1873 年经济大恐慌以来，罢工在各个产业部门此起彼伏，几乎没有停过。事实上，如果看到某个行业的工人一连几个月不间断地工作，那倒是例外了。

读者只要注意到上面所提的年代，自然会认识到产业界的动荡不安是一个伟大运动处在萌芽和分散阶段的现象，后来具有现代社会特点的工业制度便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回顾以往，一切都很明白，就是儿童也能理解，但在当时，我们不是先知先觉，对于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当时确实感到国家在产业方面正面临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在工人和雇主、劳方和资方之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劳动阶级非常突然而又普遍地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深刻的不满，而且

设想只要他们知道如何着手改变现状，情况就会大大地改善。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同一步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居住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享受到高雅奢华的生活。在当时看来，除非世界大大地富裕起来，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有个笼统的概念，但是关于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却茫无头绪。只要有人似乎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一点教导，他们就会满腔热情地去拥戴他，结果许多自封的领袖便突然名噪一时，其实某些领导人并没有什么见解可以教导他们。不管人们认为劳动阶级这些愿望多么难以实现，他们却把罢工当作主要武器，在罢工中的那种相互支援的热诚，以及为了实现理想而作的牺牲，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坚定的决心。

当时，一般人都把我所描述的这种运动称之为劳工纠纷。对于它们的最后结果，我这个阶级的人们由于个性不同，看法也不一致。乐观的人断然肯定，就事物的常情而论，工人新的愿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原因仅仅是在于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物资来满足他们。人类之所以没有即刻挨饿，也仅仅是由于大多数人做得多，吃得少；只要整个世界还是那么贫穷，大多数人的境遇是不可能有多大改善的。这些人认为，工人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家，而是人类牢不可破的环境。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一点，并决心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命运，那只是他们的智力问题罢了。

不太乐观的人都同意这些说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人新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担心，深怕要等到社会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有投票权，如果他们高兴，也有力量这样做，而工人领袖们也